

目 录

前言	(1)
我的经历	余 冰(1)
回忆《襄西报》时代的战斗生活	彭流云(9)
解放前宜昌中等学校概述	安庆云(17)
刘梅森谈永耀电气公司	项克涛记录(25)
泰丰织布厂简史	望鼎元遗稿(31)
解放前宜昌手工业简介	李 林(36)
宜渝水运史略	陈迺康(57)
宜昌商业历史概况	宜昌市工商业联合会(61)
解放前宜昌金融业记略	
..... 中国人民银行宜昌市支行	(81)
公济钱庄的来由	项克涛(104)
宜昌土布业概述	冯锦卿(107)
宜昌磁器业发展史	喻子凤(116)

宜昌历史上鸦片市场一斑·····	冯锦卿(125)
旧中国的宜昌洋行·····	冯锦卿(131)
抗战后宜昌商会拾零·····	张懋周(138)
宜昌佛教的变迁·····	超明(144)
、宜昌市基督教的梗概·····	余金汉(152)

我的经历

余冰

一、童年

我出身在湖北省大山区长阳县傅家堰，家里很穷。我爷爷一生给人家做短工，爹一辈子给人家做长工，六十岁给东家背脚过清江河时，不幸失足落水淹死。妈妈带着我们兄弟姐妹租种几亩坡地。年成好除交捐租外，余下的粮食，弄些野生植物拌着吃，勉强可以维持一年的三分之一的生活，剩下的日月就靠妈给人家做短工，换点粮食拌野生植物糊口。若遇年成不好，租都交不齐，生活就完全无着。因缺吃少穿，生活很难，把几个姐姐都早嫁了。

我长到十二岁，妈看我体弱个小，无法在那坡地做农活，就叫我捡桐籽换点钱，到表哥家去读书。从二月到五月，我一本《三字经》还未读完，先生病死了，只好又回家，跟着妈种地。到十一月，妈看我种地实在不行，叫我去跟张泽勋师傅学裁缝。当时学徒合同规定，学徒三年，我不取分文，学徒期满后，给我一套裁缝工具。

学到两年多的时候，我们当地有了农民协会。师傅有个叔叔参加了。有一次，他们夜间“打”了一个土豪，土豪家族不依，把师傅的叔叔捉去，要用绳子勒死祭祠堂。师傅约人去劫法场，把他叔叔救了出来。我跟师傅他们一起逃到巴东边境，

因无手续不敢过境，又返回本地。正好，有红军从我们那里路过，师傅和他叔叔就跟红军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本地做工。因未出师，不敢单独给人家做活，又跟一个亲戚学裁缝手艺。这样慢慢熬过了我的童年。

二、革 命

一九三二年五月，革命的风暴吹到我们山区。一天，天气晴朗，我做完活，背着工具包回家。刚翻过一个山岭，就看到前面来了很多人，不多时就与他们相遇了。一个中等身材的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做工的。他又问我是做什么工的，我说我是做衣服的。他不信。问我包袱里包的什么，我说是做衣服用的工具。他还是不信。要我把包袱打开他看。他看了我做衣服的工具，又看了我的手，才相信。就问我当地哪家是地主，我说大龙坪的李兴汉、傅家堰的张开照、青山墩的向作忠都是地主，红军“打”土豪，把他们都打倒了，现在只有我大伯。他们问“打”我大伯的土豪没有，我说没有。他们又问我大伯住在那里，我说他住在龙潭拐。他们要我带路。在路上，他们问明了我的情况，就动员我跟他们一块去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从谈话中，我才知道他们是红军独立师游击三大队，跟我说话的那个人是分队长许树廷同志。他们的话正合我的意，听得很入神，满口答应参加红军。到了我大伯家，找他筹八百元钢洋的款。事后，我便参加了革命。

三、随贺龙战斗的年月

一九三二年五月，我参加革命后，编到独立师，当一支队

长许树廷的勤务员。师长是王炳南，政委是芦东山。我们这支队伍接受贺龙军长的指挥。

这年七月，部队离开湘鄂边区，从长阳插到松滋的磨盘洲，渡江到江北。当时正值长江发大水，被阻误了时间，到胡家场时，红三军七、八、九师已撤离洪湖，没有能会合。就辗转至张溪河、后港、石灰桥一带打游击。

八月间，我们转战到荆门皮家集、烟墩集一带。在烟墩集遇到当地难民要跟我们走。人多了，住房发生困难，难民都集中在稻谷场露宿，做饭的火引燃了大堆的稻草。王炳南师长看见火花，以为发生敌情，集合一团离开；我们刚扑灭大火，芦东山政委带的二团集合出发时，敌军前来袭击，队伍被切断，和师部失去联系。我就随大部队迁回到荆门、当阳、远安一带游击。一九三三年春节前循到兴山。一个晚上，我们在黄泥坪“打”了上蒙，第二天在香溪鲤鱼口过江，回到长阳枝柘坪才和军部会合。

当时，由于肃反扩大化，部队人员损失不少。整个军剩下不足一万人。于是把独立师改编成九师，仍归红三军贺龙同志直接领导。我调为九师汤富霖师长的警卫员。一天，我听说贺龙军长把一个来劝降的国民党要人，在摸清敌方底细后，处死在永顺县龙家寨，感到很痛快。一九三四年夏，部队在由永顺向大庸、龙家寨的运动中，敌人以八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贺龙同志安排了一个口袋，把敌人引到一个有利的地形，一夜工夫，就把八个团全部消灭。

一九三四年冬，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改红三军为红二军，七、八、九师改为四、五、六师。我调为六师政委廖汉生的警卫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贺龙同志的指挥下，在永顺县中包围并消灭敌人四十一、四十八两个师，活捉四十一师师

长张振汉。

四、强渡狗洞索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接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的指示，要我们继中央红军以后，向陕北进发。我们从湖南桑植县出发，边走边打，到达贵州烂泥沟。一天，接到通知，六师的师团首长警卫都到侦察连去集中。我仍在师部当警卫员，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侦察连，听了师参谋长常德善的讲话后，才知道是要我们和侦察连的同志在参谋长的带领下，一起化装，用快行军的速度，去抢渡狗洞索桥，完成突破敌人封锁线的任务。参谋长命令我们：一要每人准备五寸长两寸粗的竹筒一个，一丈左右长的绳子一根；二要我们立即出发，在天亮前占领桥头堡；三要我们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也要完成渡桥任务。我们立即锯竹筒、搓绳子、吃饭。饭来不及吃完，集合出发的命令就下达了。有的同志把饭用手帕包着，一面走一面吃。出发不久，天就黑下来，上半夜是顺着公路走的。途中看到一只野兔，我们就沿路赶，把它赶得累倒在公路上。我们就用这小跑的快速继续行军，天还未亮我们跑了一百六十多里，到达了目的地。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来的这样快，桥边除有一个哨兵在碉堡门口站岗，其余的都还在酣睡。我们一枪未发，就把这个碉堡的敌人全部缴了械。天刚亮，我们准备渡桥时，被对面桥头敌人发觉，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这座桥是我们突破敌人封锁的唯一通道。为了不让敌人破坏索桥，我们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用强大的火力封锁敌人，掩护渡桥；另一部分人担任突击，强行渡桥。

桥的两岸都是悬崖陡壁。索桥是用竹绳子从两岸牵起来

的。过桥的人是坐在滑筒吊绳上，用双手抓着滑筒象打秋千似的悬空中滑过去。滑到中间滑不动时，就要转身用双手一把一把的从竹绳上向上爬。突击队员一上桥，敌人就在碉堡里猛烈向我们射击，许多同志都在敌人扫射下壮烈牺牲。而我们活着的同志战斗更英勇。我是随着侦察连二班执行任务，是抢渡索桥的第二名突击手。到了桥中间，一颗开花子弹打中了我的脸部，血流不止，我忍着痛和同志们一道抢渡。我们终于过桥去消灭了敌人，随即在河下搭起浮桥。大部队赶到，安全过河。接着打开了黔大毕，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长征中的一次战斗

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八月，经过近一年一面行军一面打仗的长征。刚出雪山草地，胡宗南、毛炳文调动他们的精锐部队，在徽县、成县一带阻击我们。为了扫清前进的障碍，掩护大部队通过，师部接军部命令，要师长带炮兵连和十八团去占领成县东面的山头，政委带警卫连和十六团去占领成县北面山头。我和张友林、朱学邦跟着政委去执行作战任务。

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团加一个连，实际上不到三百人，既缺粮草、又缺弹药，但一听说战斗，斗志很旺。天刚亮，就占领了北面的山头，警卫连和我们跟政委廖汉生在指挥阵地，十六团在我们这个阵地的两翼。从上午九点开始战斗，到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向我们发起了多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快到天黑的时候，敌人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们部队伤亡很重，警卫连的机枪都没有人打了，师部通信主任刚拿起机枪还未打响，就被敌人子弹夺去了生命。我们警卫员为了保护首长指挥战斗，朱学邦牺牲了，张友林负了重伤，在这紧急关头，我一跃

身跳在工事上右手举起手榴弹，左手正去拉导火索时，敌人一颗子弹飞来，打碎了左胳膊骨，接着我用嘴拉响手榴弹，就在甩出的同时，又一颗子弹打入大腿，从臀部穿出，我从工事上倒下来。最后我们还是坚持完成了堵击任务，使部队实现了顺利的转移。

六、我在南泥湾

我们到延安以后，党中央为了联合各阶层对外抗日，决定停止没收地主的财产，而靠抗日救国公粮又不够，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封锁的紧紧的，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战斗号召，“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精兵简政。”抽调人员开展大生产。我当时在军委总政务处任指导员，带领机关抽调出来的警卫员、饲养员及年老体弱的同志，到延安东南方向的南泥湾开荒。

南泥湾方圆数百里，是一遍大荒山。荆棘遍地，野草丛生，白天雀鸟啼，夜间虎狼嚎。要叫这样的地方长出粮食来，显然是很困难的。当时，毛主席号召我们，第一年要达到自给，第二年做到耕二余一交公粮，我们肩负着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向大自然作斗争，向荒山要粮食。

刚到那里时，住的是树枝搭的棚，遇着下雨，人都被淋的透湿。吃粮食要组织人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背，往返要四五天的时间，有时接济不上，就得吃稀饭和野生植物。生活虽苦，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晴天开荒，雨天伐木；白天生产，夜间打猎；春夏开荒种地，秋冬砍柴烧炭。我受伤的左膀并未全愈，在劳动中，和大家一起干，用一只手掌锄把除草。经过我们辛勤劳动，完成了党交给我们耕二余一的任务，做到猪羊满圈，

牛马成群，粮食满仓。使大家吃得红光满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七、重上前线

一九四六年是日本侵略军投降的第二年，本应全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集中全力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们不得实行自卫反击。

这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央组织部就指定我从党校学生中组织一个干部队到上海去组织地下工作，并要我任队长，徐矾同志任指导员。我们带着三十多干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初从延安出发，经延川、山西介休、穿过敌人封锁线、越过太岳山，又经黎城、跨过太行山，经河北武安、邯郸、肥乡、再经过山东鄄城、菏泽、巨野、嘉祥、济宁、泗水、平邑费县，历时近两月，长途跋涉二千里，于六月二十七日到达临沂。

第二天上午，我和徐矾同志将从延安带去的干部档案交给了华东局。接待的同志叫我们暂时休息，听从分配。我回到招待所，还没坐下，就有同志告诉我，组织部来电话，叫我到鲁中行署医院工作，要我马上去找马主任联系，准备出发。我和马主任当天晚上就离开临沂，经蒙阴、新泰、莱芜、到淄博鲁中行署。刚到就接工委电话，叫我去开会。为了防空，会在一片柏树林里开。我刚到会场，工委书记就对我说：“你到医院去任协理员，敌人在胶济线和我们打响了。你赶快走组织医务人员开赴前线。”我重新回到前方，参加了莱芜、孟良岗、济南、淮海、渡口等战役，又随军渡过长江，参加了解放福州、

泉州、厦门等地的战斗。直到身患重病，才调离前方，由组织安排到南京医院休养。

（根据中共宜昌市委党史征集办公室所供稿整理）

回忆《襄西报》时代的战斗生活

彭 流 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我们住在大洪山区双河。在听过江汉军区首长张才千、刘建勋、郑绍文、宋侃夫等关于准备渡江作战报告后的第二天，社长王国同志突然喊我谈话，说他正在作进城的安排，开门见山地问我是愿意进宜昌，还是进武汉？并说明愿进宜昌，就随肖松年同志去办《宜昌日报》，愿进武汉，就去办《湖北日报》。当时只有十九岁的我，想到革命形势发展真快，我在地下党的指点之下离开武汉跑到解放区，参加《江汉日报》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日子，就真的按照毛主席的预计到来了。解放全中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兴奋之余，我不假思索的答了一句：“愿意进宜昌。”

离开的那天，社长王国，副社长陈冷、总编顾文华、主编副刊的诗人郑思，以及黄铁、戈风、陈英等同志，都热情地和我们握手道别。那一段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高级干部和小兵之间的亲热劲儿，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们这穿着一色土八路军军的队伍中，有原《江汉日报》编辑主任肖松年和他的爱人胡中慧，有采通科副科长杜唐和他的爱人肖瑾，编辑科长余野与采编人员孙方和我，电台报务员句道本，印刷厂干部张承堂，肖松年同志的警卫员小鲁和饲养员老孙，再加上新近南下的干部带来的肖松年同志的姑娘克

强、克俭和他的抱在怀里的小女儿肖小毛，杜唐同志的小儿子杜小胖。从人数上看，可算个加强班。但行进在解放了的土地上，迎着笑脸相迎的春耕的群众，我却有浩浩荡荡之感。

这时候，离粉碎国民党白崇禧所部张淦兵团对江汉军区七十天的“扫荡”已经两个多月，离我江汉独一师在荆当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一万多人，活捉七十九军军长方靖的大捷已经一个多月。一路上平安无事，经过八天的夜住晓行，在荆门八角庙找到了襄西地委后，与苦心经营《襄西报》的于元盛、周健、尚彬如、张明一、赵开武、王志青、林一震等同志欢乐地会合，组成了进宜昌办《宜昌日报》的基本人马。在进城以前，继续出《襄西报》。

《襄西报》一直是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下编辑出刊，比在大洪山办军区的对开铅印大报更艰苦更困难得多了。本有一套石印设备，因为太笨重，不便于游击环境下的随时会有的转移，就藏在南漳县大山区。出一期石印报，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所以经常是抓住转移的空隙，把新华社发来的电讯编成油印的《新闻》，通过四分区的通讯系统送给各个游击县区。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就编辑地方稿。如支前工作，分区部队的战斗捷报，斗争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新区群众的诉苦会和拥军爱民等方面的消息和通讯，出版《襄西报》。

会合不久，大约在四月初，转移到荆门县城，我们报社住在荆门县中学。这时环境比较安定，又继续出石印的《襄西报》。连续出了五六期，这就忙坏了担任通联工作的周健同志。他身体不怎么好，但工作之积极、认真、细致，是在全社工作人员中有口皆碑的。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可他一天到晚伏案工作，晚上还在油灯下给通讯员写信。

回忆当时我们这支队伍，可算是很“棒”的。人数虽不

多，但有好几个很有特色的人物。除上面提到的周健同志以外，社长肖松年是三十年代的大学生。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写起评论来，就象不怎么费力，又快又好；分析起某一问题或文章的优缺点来，谈的叫人心服口服。采通科副科长（后任副社长）杜唐虽然读书不多，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政策水平高，原则性强，审稿一丝不苟。编辑科长余野业务相当熟练，他看一遍新华社发来的原稿，再看编辑的标题，觉得需要修改的，提笔一挥而就。记者于元盛，当娃娃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十五岁就带过一个区的武装和日本侵略军作战。他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接近群众，革命战争和群众工作，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口若悬河的鼓动家。他的采访总是丰富多采。孙方是名气较大的辅仁大学的学生，却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味道，被同志们戏称为游击队里的“火头军”。他的采访可以说是采必用，进城以后，是很得力的高产记者。编辑张明——当时就有“老报人”之称，业务熟练，喜爱文学，能作对联。记得进城后过第一个新年的时候，他就针对当时《宜昌日报》差错太多的情况，写了一幅对联贴在大宿舍的门口，上联是：“左更右更更正满篇”，下联是：“一错再错错过一年”，横联是：“粗枝大叶”。担任电台台长的句道本原是三五九旅的报务员，曾在王震同志身边工作过，收发报技术是过硬的。但是，收发报机是战利品，已经很陈旧，常常受天气的响影和出故障，避免不了电码的脱落，给我这个新闻战线上的新兵造成莫大的困难。碰到一句话脱落几个字，或者一组电码掉那么一两个数字，我就得根据文章的语法、语气去猜呀，分析呀，再按几种设想查阅电码本，尽力争取把脱落的字句填补起来。我敢说如果再那样工作三五个月，我这搞编辑工作的也可当个译电员了。

最叫人怀念的是当时那种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编辑部里集思广益的民主空气，领导同志严于律己的老八路作风，大家都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等活跃的政治空气。

按照当时的规定，肖松年同志是小灶待遇，我这小兵不讲客气，常常端着饭到他那里拈菜吃，老肖亲切地喊我“游击司令”。要是连续几天不去，老肖就喊：“游击司令同志，你怎么不来打游击呀！”

难忘的四月二十一日，收到我解放大军按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千船竞发，万炮齐轰，开始渡江作战的电讯。编辑部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张明一同志满怀激情，标了一个很得意的大标题：“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编辑科长余野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不同意。大家也都觉得这个题标得很有气势，余野同志也放弃了他的修改意见。过了几天，各大军区和军区的报纸先后来了，其中一个大军区报纸的引题、主题、付副题与张明一同志的标题全相同，余野同志也和大家一样高兴。

有一次，我军打算消灭盘踞南漳巡检司的一支国民党匪军，社长老肖派于元盛同志去采访，老于跨上社长的坐骑，立即出发。大约超过预定时间五天以后才返回报社驻地。老于刚进门，社长就批评他为什么超过了时间不汇报情况？老于说：

“你等我汇报之后再批评好不好？”原来老于在执行任务时，遭到敌人包围，他机智地把马赶进深山老林，自己钻进一个山洞。脱险后不仅完成了采访任务，而且与当地区委取得了联系，动员了几个青年参加了革命。最后，老于说：“我要检讨的是没有通过军事通讯系统汇报情况的变化。”于是，肖社长表扬了老于执行任务取得的成绩，对他不及时汇报情况提出了批评，又对自己不问情况就乱加批评作了检讨，使大家都受到

很深的教育。

至于领导同志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事，也是数不胜数的。有一次划房子，秘书尚彬如同志感到十分为难：把大间分给社长吧，编辑部办公室太小了，把小间给社长吧，这小间又小得太不象样。正当他难下决心的时候，老肖看到老尚犹豫不决的样子，就批评说：“你是怎么想的？是把大家安排好了作用大呢？还是我一个人作用大呢？”秘书紧锁着的眉头舒展了。这位吃小灶的领导干部就住进了一间黑咕隆冬的不足九平方米的小房里。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之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势头，正象毛主席写的渡江作战这一重大新闻所形容的有如“摧枯拉朽”之势。石印报就远远跟不上这种形势了，我们就全力搞起“号外”来，及时把重大新闻抄写成大字，贴到城内外和邻近集镇上；又油印出大批“号外”发给赶集的农民和流动小贩带到更广阔的地区。看到许多城乡人民围观与互相传告胜利的喜讯，我们心里也乐滋滋的。可巧，这时两个报务员句道本和林一震同志先后病倒了，领导就要我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口语广播。在抄收“解放上海”这一重大胜利消息的时候，由于心情的激动，加上汗水在太阳穴一带流得痒痒的，忍不住用左手去摸；谁知汗湿的手触到耳机，被麻了一下，造成一句话脱落不全，使我好久都感到不安。

在大好形势之下，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我们的队伍也迅速扩大：先是江汉公学襄西分校的陈维、陈正邦等被分到报社，杨守彦、张念亲、阳淑远、于志道、金康元、李新维、汤希树、程邦恒、敬光保、刘震、苏明诗、小姜、小石等十多个“小鬼”从荆当南远来到报社，转移到当阳消溪河芦家湾时，又增加了山俊和周国楷。

在我军节节胜利的时刻，盘踞在宜昌的宋希濂侈言要“扫荡”荆当远，在离我们驻地荆门城不远，接连发生小股匪特的骚扰。我们这支拿笔的队伍也就拿起枪来。一天夜间，我同张明一同志放哨。我挎着步枪，明一拿着手榴弹，到深夜，我们突然发现一人从县中门前的小河石桥上来，左拐朝城内方向扬长而去。我们一连高喊三声口令，他竟置之不理。按照领导同志的布置，三声口令不答应，就可以开枪。我端枪推弹上堂。明一迅即把我拉了一下，并小声说：“莫忙，我们从两侧包抄上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哎哟，等我们把他抓住的时候，才知道是个聋哑人。是不是装聋作哑呢？喊起一个老乡问了一番，证实了他是城里的一位理发匠。不是明一谨慎，险些误伤了人命。

渡江作战前，江汉区党委宣传部长王延春同志被派到襄西地区接替彭天琦同志任地委书记，而由彭天琦、刘真、何定华、肖松年、赵仲云等同志组成宜昌市委和市政府，由彭天琦同志任市委书记，刘真同志任市长，何定华同志任组宣部长。解放上海后不几天，我们就随市委离开荆门朝当阳进发。当时领导同志指出：“往前就是新区，群众对我党政策还不了解，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群众纪律。人人都要做群众工作。”我们这支新闻队伍就基本上成为一支群众工作队。记得到达当阳消溪芦家湾扎营的当天。我们就分别找活干。有的打扫房前屋后，有的找桶挑水，搞“满缸运动”，有的拿起空着的连枷和农民一起打场，有的找老乡谈天，宣传党的政策。时间一天一天增长，群众和我们的了解也逐渐加深。记得第一天给房东老大娘挑水的时候，她满带着疑虑说：“哎呀，我们这里就是缺柴烧呀！”我们没有解释，只是一个劲的挑，挑到缸满为止。一连好几天，她看到我们洗脸洗澡，都到井边去提水，有时干脆到

河里去洗，老人家的顾虑消失、对我们喜笑颜开了。特别感人的是当我们得到紧急军情，准备凌晨三点开拔的时候，老大娘把她十七岁的闺女喊起来帮我们准备干粮、补袜子、补裤子，在依依惜别中，老大娘给我们讲了个大笑话：“同志们约，国民党说你们有闻香队，闻到香就要杀人。我老头子满六十岁，偷偷地到街上割了斤把肉，割回来又不敢弄，怕你们闻到了香。好不容易等你们都睡了，半夜三更才躲在房里弄给老头子吃。第二天有个同志笑着问我，我吓得没得法，那晓得没有一文钱的事。我才知道你们没有闻香队，那都是国民党瞎说的，你们真是穷人的军队呀！”半夜出发的时候，那位六十老人坚持要送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大约送了三里多路，才被我们劝回去。

国民党兵团司令宋希濂在他复灭的前夜，妄图作困兽之斗，拼凑了号称三个军的兵力，出宜昌去“扫荡”我荆当远地区。在他的前锋一出动，上级就指示沿汉宜路绕荆当路两厢“打开口袋”消灭敌人，我们就按市委的命令，从容地转移到当阳观音寺集中学习。主要是学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学习入城政策和“十不准”纪律。在一个山冲里，市委书记彭天琦同志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详细介绍了宜昌的军事地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对宜昌各社会阶层作了透辟的分析。听过这个报告之后，编辑、记者们对进入宜昌后“依靠谁”这个问题讨论得最为热烈。所以，这次学习不仅仅是使大家明确了入城纪律，有了防止“糖弹攻击”的思想武装，对进城后如何办好《宜昌日报》，也是一次很好的思想准备。

在这期间，《襄西报》是停刊了。但我们也象《江汉日报》同时也是新华社江汉分社一样，我们也是两块牌子，一个